第 53 卷 第 3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3, No. 3
2016 年 5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16

古代小说前沿问题丛谈(之十)

主 持 人 语

从 2007 年开始,承《北京大学学报》襄助,我们开辟了“古代小说前沿问题丛谈”的栏目,每年围绕一个中心议题,共同切磋,分头撰写,包括本次丛谈,累积已达三十篇论文。虽然这些议题不能涵盖古代小说所有重要问题,但关乎小说本体的文体、情节、人物、主题、结构、语言、时空、素材(本事)以及研究的角度、方法等命题,大多已有涉及。本次论题则是关于古代小说当代性的诸方面,我们希望以这一具有时间意义的话题,作为丛谈的一个开放性的小结。

历史上,小说地位卑下,明中后期开始逐渐兴盛小说评点,也许可以称之为小说研究的史前时期,尽管我们不能低估其理论价值,但从总体上说,小说评点还是以鉴赏为中心的零散批评。更重要的是,这种批评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一样,仍然被主流的正统文学所忽视或排斥。从这样的角度看,古代小说进入文学史,并在整个文学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考察这一过程,正如潘建国在《中国文学史中小说章节的变迁及其意义》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不仅可以了解古代小说的学术史和教育史,同时,也能窥见中国文学史体系和文学史观嬗变之轨迹。

古代小说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学遗产,它还以各种方式参与着当代精神文明的建构,对现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对此,学界有所研究,李鹏飞的《论中国古代小说对现当代小说的影响》一文,着眼于“故事新编”或翻案小说、“新笔记小说”这两种特殊的现象,实际上分别涉及了题材、文体两方面的影响,具有举一反三的启发性。该文最后提出:中国古代小说这座巨大的宝库一直都是后代作家们的源头活水,只要慧心者能善加利用,就一定会获得无比丰厚的酬报。这一观点既是历史事实的归纳,也是对当今小说家一个有益建议。

无论是从学术史说,还是从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看,《红楼梦》在古代小说中都可谓首屈一指。因此,刘勇强的《作为小说标准的〈红楼梦〉》试图探讨这一标准的内涵及其形成过程与实际影响。虽然文中提出了一些对《红楼梦》作为小说标准的异议,但丝毫不意味着对这部小说无可替代的崇高价值的怀疑或否定。相反,本文的致力方向,正是希望通过对相关问题的反思,更清晰地把握《红楼梦》的经典意义。

披阅十载丛谈,远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的合作还会继续下去,也期待得到同行一如既往的指教。

刘勇强

中国文学史中小说章节的变迁及其意义

潘 建 国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而不登大雅之堂,为精英文人及藏书家所轻忽。其地位的全面提升,迟至近现代才得以实现。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各种矛盾空前激

收稿日期:2016－03－01
作者简介:潘建国,男,江苏常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化,天下动荡,变故丛生。意识到积贫积弱现状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如何救国强国,他们受到西方文艺观的启发,将小说等俗文学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响者云集。虽然,其最初动机仍在于文学之外的政治,但客观上却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并进而抬升了小说的文学地位,时人陆续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①、“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②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降,随着蔡元培、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对于《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传统小说的关注和研讨,关于古代小说文献之搜集整理以及文本之考订研究,逐步成为学界热点,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为一门新兴专学,其学术地位遂得以确立。而当其社会、文学及学术地位得以次第确立之后,古代小说如何作为中国文学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进入各类教育课程,自然也就被提上了日程。早在 1907 年,一位名叫“耀”的文人就发出了《学校教育当以小说为钥智之利导》的呼吁③。此处,笔者拟专以《中国文学史》为线索,检讨古代小说如何进入文学史,并在其间开疆拓土,日益丰富,直至占据明清文学史的叙述中心。考察这一过程,不仅可以了解古代小说的学术史和教育史,同时,也能略窥中国文学史体系和文学史观嬗变之轨迹。

目前所知问世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编撰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该书虽已设专章论及《好逑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中国小说④,但它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都极为有限,暂且置而不论。真正对中国早期文学史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东邻日本学人所编《支那文学史》,据调查⑤,仅从明治十五年(1882)至四十五年(1912)的 30 年间,就有 14 位日本学人先后编撰出版了 20 余部《支那文学史》。其中,问世时间最早的是末松谦澄(1855—1920)所撰《支那古文学略史》(1882)。最早将“小说”写入文学史的,是藤田丰八(1869—1929)所撰《支那文学史(全)》(1895—1897 年间)⑥,该书第二期“中世文学”其二“东汉文学”其四“小说之萌芽”,不仅述及《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所载诸篇和《山海经》《穆天子传》《飞燕外传》《杂事秘辛》等小说,而且还十分敏锐地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老庄思想、神仙方术以及汉赋的铺陈叙事等因素相关联,可谓独具慧眼。最早将白话小说写入文学史的,则是笹川种郎(1870—1949)所撰《支那文学史》(1898),其第七期“金元之文学”下设“小说与戏曲的发展”,论及《水浒传》《三国志》;第八期“明朝文学”下设“小说与戏曲”,论及《西游记》《金瓶梅》;第九期“清朝文学”下设“小说与戏曲及批评”,论及《红楼梦》和小说评点家金圣叹。需要指出的是,早在 1897 年,年仅 27 岁的笹川便完成了《支那小说戏曲小史》一书,交由日本东华堂出版,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元明清白话小说专史,笹川《支那文学史》中的小说段落,实际上大多节采自该书,仅新增了一小段关于《金瓶梅》的论述文字;此外,笹川《支那文学史》没有论及元明之前的小说发展情况,也未涉及文言小说,这恐怕也是因为受到《支那小说戏曲小史》束缚的缘故。至 1903 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刊出了久保天随(1875—1934)的

① 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1903 年第 7 号,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8—81 页。

② 黄人:《〈小说林〉发刊辞》,《小说林》1907 年第 1 期,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 254 页。

③ 文载《中外小说林》1907 年第 7 期,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 230—233 页。

④ 参见赵春梅:《简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西北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

⑤ 参见段江丽:《明治年间日本学人所撰“中国文学史”述论》,《中国文化研究》2014 年冬之卷;另参黄霖:《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古典文学知识》1999 年第 5 期。

⑥ 本文所引诸家日人所编《支那文学史》,均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公布电子扫描本,网址为 http://www.ndl.go.jp。

《支那文学史》(书末跋文署“明治三十六年八月七日”),第一次将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同时写入了中国文学史,其第二期“中古文学”第一“两汉文学”之七为“小说之发展”,第四期“中世文学”第一“金元文学”之六为“《水浒传》与《三国志》”,第二“明代文学”之九为“《西游记》与《金瓶梅》”,第三“清代文学”之三为“金圣叹”、之十为“《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之十一为“其他传奇及小说”。审其文字,明显参考了之前藤田丰八、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的相关内容,但在小说作品方面又有新扩展,首次论及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燕山外史》《花月痕》《野叟曝言》《荡寇志》《镜花缘》等,还提及了汉代之后的文言小说,包括明代瞿佑《剪灯新话》、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以及《谐铎》《西青散记》《子不语》《夜谈随录》《萤兰馆外史》《夜雨秋灯录》《啸亭杂录》等。久保天随的《支那文学史》又直接影响了之后两部文学史的小说叙述,即宫崎繁吉(1871—1933)《支那近世文学史》(1904,金元至清代)和儿岛献吉郎(1866—1931)《支那文学史纲》(1912)。

明治时代日本学人所撰《支那文学史》的中国小说书写,大抵如此。倘如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不免显得有些简陋和零散,但在当时已属不易,尤其是与同时代中国学者所编文学史相比,无论在小说史知识还是小说观念层面,它们皆相当领先。究其原因盖在于:一方面日本具有较为良好的研读中国文学的传统和基础;另一方面,日本较早对外开放,并接受了西方文学史观的影响,在高等学校开设文学课程,上文提及的《支那文学史》实际上多为课堂讲义,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则是东京博文馆推出的“帝国百科全书”之一。可以说,正是中国学传统和世界文学史观的因缘聚合,催生了明治时代众多《支那文学史》。

国人的文学史编纂,缘起于京师大学堂的设立,1903 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下设“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等十六门课程,由于课程大多为新设,没有现成教材,需要教习自行编选,《章程》建议讲授“历代文章流别”课程的教员,参考日本《中国文学史》编订教材。1904 年,大学堂教员林传甲(1877—1922)根据《章程》所列研究文学要义,“取以为讲义目次”,又“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①,编就《中国文学史》讲义。此书没有叙及小说,其第十四篇“唐宋至今文体”之十六“元人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云:

> 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既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混;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而近日无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不究科学,而究科学小说,果能裨益名智乎?是犹买椟而还珠者耳。吾不敢以风气所趋,随声附和矣。

林氏对于传统说部、晚清新小说以及笹川种郎的小说观,都给予了严厉的批斥,这自然和他较为保守的文学观念有关,但同时恐怕也是受到大学堂规定和京师风气制约的结果。1904 年 10 月 2 日,京师大学堂第三类班班长翟士勋“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查获后竟被处以“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②,不难想见,大学堂既然连学生私下阅读小说也严加查禁,又怎么会允许在文学史课程中涉及此类内容?

与国立京师大学堂的正统端肃形成鲜明对比,作为私立教会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的文学史讲义,黄人(1866—1913)编撰于 1940—1907 年间的

①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卷首引言,京师大学堂 1904 年铅印讲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② 《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52 页。此则有意思的史料,首先由陈平原教授提及,见其《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序文第 3 页。

《中国文学史》①,显示出了颇为令人惊喜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由于苏州毗邻上海,得开放风气之先,又受到以日本太田善男《文学概论》(1896 年东京博文馆初版)为代表的东西洋著述之滋养②,黄人对于文学特质和中国文学史体系的认知,较之林传甲胜出一筹,钱仲联赞其“创论层出,冠绝时贤”③,洵非溢美。而值得注意的是,黄人第一次将古代小说带入了国人自编文学史。该书有四个部分述及古代小说,集中于第四编“分论”,第一部分为第二章“上世文学史”第二节之七“古小说”,论及《山海经》《穆天子传》两种;第二部分为第三章“中世文学史”第三节之四“魏晋南北朝小说”,论及《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搜神后记》四种;第三部分为第三章第四节之六“唐新文体”,引及《虬髯客传》《柳毅传》《杜子春传》《聂隐娘》四种,黄人认为“小说界至唐而广”④,此说与后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谓小说“至唐代而一变”、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诸语,颇相暗合;第四部分为第四章“近世文学史”第一节之八“明之新文学”,于曲本、制艺之外,单列“明人章回小说”一体,认为明代文学家中“通俗小说与八股、传奇鼎峙”,小说体现了一个时代“社会风俗之变迁,人情之浇漓,舆论之向背”,不但可以“补简册”,也适合作为“普通教育科本之资料”。黄人又创设“历史小说”“家庭小说”“军事小说”“神怪小说”“宫廷小说”“社会小说”“时事小说”等七类,论及 19 部明代章回小说,其中包括《北征录》《白龙鱼服记》《骊泣志异》《祁禹传》《彩女传》《卖辽东传》《穷奇镜》等 7 部今已亡佚的珍稀秘籍⑤。黄人对于通俗小说的特殊关注,并非偶然,实际上,就在编撰文学史的前后这段时间内,他积极地参与了诸多小说活动:1902 至 1906 年,黄人译述发表了《银山女王》《哑旅行》《大复仇》《日本剑》等小说;1904 年,他的常熟同乡曾朴、徐念慈、朱积熙联合创办了晚清重要的小说编刊机构——小说林社,1907 年又创办晚清四大小说期刊之一的《小说林》,黄人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发刊辞,并连载发表了其研读小说的札记《小说小话》,很显然,有了这些活动作铺垫,黄人将小说写入文学史,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令人遗憾的是,黄人《中国文学史》迟至 1911 年才由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洋洋二十九册,流播似乎有限,其学术价值直到 20 世纪后期始受关注。不过,当年协助黄人编写文学史的另一位文人吴梅(1884—1839),于 1917 年 9 月应北京大学之聘,讲授文学史和词曲课程,在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自唐迄清)》⑥讲义中,关于唐人小说和明代小说的叙述文字,基本上采自黄人《中国文学史》,黄人的小说之声借由如此独特的方式,辗转传入京师的大学课堂,亦堪称佳话。

---

① 此书由国学扶轮社正式出版于 1911 年前后,但其编撰时间早在 1904—1907 年之间。与黄人同任东吴大学教习的徐允修,在其《东吴六志·志琐言》中载云:“光绪三十年,西历 1904 年,孙校长以本校仪式上之布置,略有就绪,急应厘定各科学课本,而西学课本尽可择优取用,唯国学方面,既一向未有学校之设立,何来合适课本,不得不自谋编著。因商之黄摩西先生,请其担任编辑主任,别延嵇绍周、吴瞿安两先生分任其事。一面将国学课择要编著,一面即用誊写版油印,随编随课,故编辑之外,又招写手四五人,逐日写印。如是者三年,约计所费已达银元五六千,所编《东亚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五六种。孙校长以此事着手业经三年,理应该择要付印。因由黄先生将《文学史》整理一过。此书系其自己手笔,开头总论、分论、略论,洋洋数百万言,均系惬心之作;以下亦门分派别,结构严谨,惟发抄各家程式文时,致涉繁泛。书虽出版,不合校课之用。正欲修改重印,先生遽归道山,遂致延阁多年。”徐书为 1926 年苏州利苏印书社出版,苏州大学档案馆藏。本文转引自黄人《中国文学史·前言》,杨旭辉点校,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 页。

② 参见陈广宏:《黄人的文学观念与 19 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资源》,《文学评论》2008 年第 6 期。

③ 钱仲联:《南社吟坛点将录》,《苏州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

④ 本文所引黄人《中国文学史》,均据杨旭辉点校本。

⑤ 关于这些亡佚小说的考证,参见龚敏:《黄人〈中国文学史·明人章回小说〉考论》,《巢湖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

⑥ 吴梅《中国文学史》讲义,存世有油印本,三册,珍藏于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2004 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发现,并收入《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影印出版。

自 1914 年至 1921 年,随着各地各类学堂的建立和文学课程的推展,文学史需求旺盛,多部《中国文学史》遂应运而生,兹择要论之。首先是两部教育部审定教材,其一是王梦曾为中学校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14 年 8 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编辑大意”第 4 则申明小说歌曲为“附庸文字”①,第三编第八章第五十三节“小说文之体变”,以寥寥百余字,简述小说渊源及文言白话之变,提及的小说作品也仅有《水浒传》《三国演义》两种;其二是张之纯为本科师范学校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15 年 12 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卷首“编辑大意”云:“近世小说戏曲日益发明,稽之古昔,实以宋元时代为最盛,本书亦择要叙列,俾知概略。”②其第三编第三章“两宋文学之大纲”第十三节“小说体之变易”,大体沿用王梦曾文字,就连《三国演义》作者也沿误题作“王实甫”;第四编《始清初讫清末》第十章“小说之盛行”,述及清代文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金圣叹《西域风俗记》、汤传楹《闲余笔话》、余怀《板桥杂记》、吴翊凤《秋灯丛录》,章回小说《廿四史衍义》《东周列国志》《东汉演义》《隋唐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为两部教育部审定的文学史教材,王、张两书关于古代小说的叙述,知识简陋,史的脉络也尚未形成,小说仅仅作为中国文学的“附庸”点缀其间。这种情况,在同时期民间出版的私人文学史著述中,有所改观。1915 年 9 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曾毅(1879—1950)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此书乃应泰东图书局之请而编,带有鲜明的商业出版的色彩,编写者曾毅其时正寓居日本东京,有条件看到日人所编诸家文学史,他在自序中也并不讳言参考东籍的事实,今人陈广宏《曾毅〈中国文学史〉与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之比较研究》认为:

> 从曾毅所著的构架来看,基本上是以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为蓝本而有所增删调整……第三编中增补了第八章“小说之发展”,述小说之缘起及其汉代小说,在第四编中增补了第十七章“唐代小说之盛兴”,述唐代传奇及笔记小说,兼及晋宋以来志怪小说之源流。这样的章节设置,也还是吸收了早期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属于新进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过,遗憾的是,曾氏的文学史在小说戏曲极为发达的明清文学之论述中,非但没有增加专论小说戏曲的篇幅,还删去了儿岛氏原著中设立的“汤显祖と明の戏曲小说”、“金圣叹李笠翁”等专章,虽然他将这两章的有关内容都放到了第五编第十四章“清之戏曲小说”之中,而且之所以作这样的调整,在主观上可能还有更加集中、鲜明地显示明清诗文流派发展线索的设想,但毕竟削弱了小说戏曲在近古、近世文学中应有的分量,由此或亦可反映他在文学观念转换过程中所显示的某种过渡性。③

曾毅《中国文学史》对于日人著述的过度吸纳,颇受后世诟病,但是,在国人文学史观、尤其是小说史观尚未成熟的早期阶段,借助“他山之石”,以补己之不足,也不无意义,这在当时实际上也是一个“不约而同”的现象。1921 年 1 月,上海会文堂书局初版的葛遵礼《中国文学史》,其关于汉、唐、元、明、清小说的简略叙述,无论从所涉作品,还是具体文字上,皆清晰可见参资日本笹川种郎、久保天随《支那文学史》的痕迹。

更有意思的是,1918 年上海中华书局初版的谢无量编写的《中国大文学史》,其关于古代小说的叙述,虽未超出前人范畴,却令人意外地引入了两种西人著作:第四编第十八章第三节“元之小说”论及罗贯中《三国志演义》,谢氏云:“近日踁德林 Candin 氏之中国小说论,以贯中文体明白显易,拟之英伦文家马考来 Macanlay,又以其结构类于希腊诗人荷马 Homer 之《伊利亚》Iliad,惟一为诗体,以为文体耳。”论及《西游记》时又曰:“踁德林小说论,则以其能合斯宾塞 Spenser 之《神后曲》Fairy Queen,与彭阳 Bungun 之《天路历程》Piligrim sprogress 为一手云。”第二十三章“明之戏曲小说”介绍明代小说时写道:“藉尔士 Giles《文学史》所称,又有《玉娇梨》一种,以其叙述不务繁冗,颇为西士所重,然吾国固罕论及之者。”第五编第四章“清代之戏曲小说”,论及《红楼梦》时又

① 王梦曾:《中国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4 年初版,第 1 页。
② 张之纯:《中国文学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5 年初版,第 2 页。
③ 文载《中国语文学》(韩国)2013 年总第 42 辑。

云:“藉耳士 Giles《中国文学史》,则称其叙述男女四百四十八人,一一生动,各具本末,殊为难能,以拟之英伦小说家斐尔定 Fielding 云。”①此处,谢氏所谓“踁德林 Candin 氏之中国小说论”,实即美国汉学家甘琳(乔治·坎德林)《中国小说》(1898,芝加哥初版);所谓“藉尔士 Giles《文学史》”,即指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所著《中国文学史》(1901,伦敦初版),此乃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其第六卷“元代”之第三章“小说”述及《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第七卷“明代”之第二章“小说和戏剧”述及《金瓶梅》《玉娇梨》《列国传》《今古奇观》《平山冷艳》等作品,第八卷“清代”之第二章乃专设“《聊斋》——《红楼梦》”一节,其关于《红楼梦》的叙述文字更长达 30 页②,郑振铎曾撰《评 Giles 的中国文学史》(1922)一文,专门予以介绍和评述。

透过早期国人文学史小说书写中存在的左采右择、“东张西望”现象,不难感受到编撰者的某种尴尬。而这种尴尬的产生,既有宏观层面的原因,即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对于传统小说的文学史价值,尚未形成明确的认知和恰当的把握;也有微观层面的原因,即关于古代小说作家作品以及小说史的学术研究,尚未得以系统深入地展开,小说知识的不足,令文学史家捉襟见肘,以致进入文学史视野的小说,总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少数几个老面孔,递相因袭,甚至出现了国人需要征引西人文字来介绍本国小说《玉娇梨》的无奈。

值得庆幸的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古代小说作为一门专学逐渐兴起并且不断壮大的时期,当时许多重要的文史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古代小说研究工作,从小说书目的搜访编制(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 年初版)、小说文本的整理出版(如鲁迅《唐宋传奇集》1927—1928 年初版、汪辟疆《唐人小说》1930 年初版、鲁迅《古小说钩沉》1939 年初版,以及以亚东图书馆为代表的书局推出的诸多新式标点本小说)、小说史料的汇编(如鲁迅《小说旧闻钞》1926 年初版、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1936 年初版),到小说作家作品的考订研探,乃至中国小说专题史的构建撰写(如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1920 年初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 年初版、范烟桥《中国小说史》1927 年初版、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1929 年初版、阿英《晚清小说史》1937 年初版等)③,均获得了长足发展,古代小说史知识累积空前拓增,小说文体演变和艺术发展的脉络,也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此为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空间。这里,必须要提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北大“小说史”课程讲义,由新潮社于 1923 年 12 月初版上册、1924 年 6 月初版下册,它的问世代表着 20 世纪古代小说史研究的最高成就,自然也成为文学史小说书写的重要参考。1930 年 7 月,泰东图书局出版了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这是其 1915 年版的修订版,据其《弁言》云“粗加改正,或去其七八,或窜其二三”,则订补力度颇大。仅就小说部分而言,文字篇幅几乎增加了一倍,涉及的作家作品数量大为扩增,最为重要的是,曾毅对于小说文体及其发展历史,有了新的认知,他在修订版第一编第六章“文学之种类”中云:“但至今日,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颇摭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此又今古形势之迥异者也”④;第四编“近古文学”之第十七章“唐代小说之盛兴”,初版仅简略列举了若干作品,订正版则强调了唐人小说的文学特质和小说史地位,指出小说“及唐,则类别转繁,境界独辟”,“而可惊可愕可歌可泣之文,则为唐小说界新起之特色”,

---

① 分别见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 1918 年初版,卷九第 25—26 页、第 70 页,卷十第 37 页。

② 翟理斯曾翻译过《聊斋志异》(1880 年伦敦初版),故其《中国文学史》中关于蒲松龄和《聊斋》的论述,也多达 18 页,仅次于《红楼梦》。见翟理斯《中国文学史》,1901 年伦敦 WILLIAM HEINEMANN 初版。另参阅李丽《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中的〈红楼梦〉》,《人文丛刊》2012 年总第 7 辑。

③ 详参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④ 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 年修订版。

“其为文逸韵横生,多为后人之所取法,而未之能逮”,“变史家之简质之记述,而为绘影绘声之描写,侠义爱情,神仙鬼怪,一炉融治,五色斑斓,而首尾鳌然,可兴可怨,小说之纯于文学之症候也”。所论卓有见地。其关于元明清小说的论述,则更为细致,但有明显采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印记,譬如曾毅论及《三国志演义》人物形象时说:“鲁肃变为痴騃,刘备近于奸伪”,孔明“乃有类于妖道”,即袭自鲁迅“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一语;在论述《西游记》的文字之后,曾毅用双行小字注明:“本近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论述《金瓶梅》时则直接节录了一大段《中国小说史略》文字,在论述清代中后期小说之时,曾毅再次写道:“兹举其荦荦大者,其详有鲁迅《小说史略》,尚有识解,可读。”凡此足以表明:没有小说学术研究的推进,没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问世,大概也就不会有曾毅《中国文学史》关于小说叙述文字的重要修订。

事实上,文学史编写者的专业背景,也会对其小说书写产生某种潜在的影响,这种学术关联早在黄人所编《中国文学史》(1904—1907)中就已有所体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数位古代小说研究者亲自操觚,编写了多部私家版《中国文学史》,有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1924年初版)、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26年初版)、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年初版)、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年初版)、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初版)等。此处,姑举影响较大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为例,略加申述。该书由北平朴社出版部于1932年初版,在自序中郑振铎明确了自己撰写文学史的动机和主旨:

> 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支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叙及之的,也只是以一二章节的篇页,草草了之,反而大张旗鼓的去讲什么河汾诸老,前后七子,以及什么桐城阳湖……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么?这是使我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重要原因。①

在上述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体系构成,颇为与众不同,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凡82章,其中小说、戏曲、弹词、宝卷共29章,约占三分之一强,这样的篇幅比例是史无前例的。其中专论小说的有10章,包括中卷“中世文学”之第29章“传奇文的兴起”、第33章“变文的出现”、第39章“话本的产生”、第48章“讲史与英雄传奇”,下卷“近代文学”之第60章“长篇小说的进展”、第65章“话本拟作者的涌起”、第66章“才子佳人书”、第69章“由《红楼梦》到《儿女英雄传》”、第72章“传奇文的再生”、第79章“清末的谴责小说”,审其文字,各章小说的叙述内容涉及作家、版本、本事、类型、文体、艺术、影响等多个层面,向着纵深和细致的方向,迈进了坚实的一大步。不仅如此,郑振铎还以小说学者的学术眼光,构拟出了古代小说史演进的若干线索和框架,一是从唐传奇到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清传奇的文言传奇体小说的发展脉络(可惜郑氏没有涉及文言笔记体小说的发展史),一是从敦煌变文、宋代话本、元代讲史平话到元明清章回小说、再到清末谴责小说的白话小说的嬗变历程,还有就是小说与诸宫调、宝卷、弹词等俗文学交互演进的横向肌理,将文学史中的小说书写推至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很显然,通俗小说在文学史园地内的尽情绽放,与琳琅满目的善本插图,一起构成了郑氏《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两大亮点。可惜这部82章的文学史,实际仅完成出版了前60章。

不妨再来考察同时期非小说专业学者的《中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北京:北平朴社出版部1932年初版,第1—2页。

国文学史》,这样或许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估古代小说学术研究的推进和小说史观念的成熟,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章节。1932 年 4 月,北新书局出版了词学专家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我认为: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这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著",其新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文学观念的新界定。在卷首自序中,胡云翼逐一批评了之前文学史的不足,要而言之,在于文学观念的驳杂,鉴于此,他明确表示:"我们不但说经学、史学、诸子哲学、理学等,压根儿不是文学,即《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中的文章,都不能说是文学;甚至于韩、柳、欧、苏、方、姚一派的所谓'载道'的古文,也不是纯粹的文学。我们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其二,文学史框架及篇幅比例的新设定。胡氏据其狭义的文学概念,按照朝代更替顺序,将《中国文学史》分为 10 编 28 章,即"先秦文学"2 章、"汉代文学"4 章、"魏晋南北朝文学"4 章、"唐代文学"4 章、"五代文学"1 章、"宋代文学"4 章、"元代文学"2 章、"明代文学"3 章、"清代文学"3 章、"当代文学"1 章,这一框架基本符合文学史事实,且比例相对匀称。其三,各阶段文学史诸体构成及其叙述重心的新确认。大致元代之前的文学史,以诗文词赋为主,小说为次;元明清文学史则详于小说戏曲,略于诗文词。就小说而言,《新著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三编之中,各设 1 章叙述小说史,占比 25%;在"明代文学""清代文学"两编中,亦各设 1 章叙述小说史,占比 33%,小说在明清文学史中的地位明显抬升,这一处理与胡氏所云"明代实是一个新文学的时期,是新兴文学压倒旧的传统文学的时期。明代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不是诗文词赋,乃是传奇与小说"①,正相吻合。细读胡氏《新著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叙述文字,在小说史梳理方面,他吸收了鲁迅、郑振铎等人的观点,认为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汉代小说大多失传,存世者多为后人伪托,故"中国之有小说,实始于两晋南北朝",然后沿着文言和白话两条路径各自演进,文言小说包括笔记和传奇两体,白话小说则包括短篇平话和长篇章回两体;在作品论述方面,则采取以小说名著为重点、兼带列举其他作品的叙述方式。总体上具有脉络清晰、论述简明的特点。可以说,自黄人《中国文学史》(1904—1907)首次将古代小说写入国人自编文学史以来,文学史中的小说章节叠经调整扩展,至此已基本定型。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问世后颇受好评,重版不断,其所构建的文学史书写框架,包括古代小说的文学史定位和叙述方式,为之后诸家文学史所认可并大体沿用。1941 年,刘大杰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初版,1949 年下卷初版②,检阅这部颇具个性特点的文学史,其小说章节的框架设置与书写方式,与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相比,并无质的变化,惟小说叙述篇幅在明清文学史中有所增加,而《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分别出现于第 27 章、第 31 章标题之中,则又显示出小说名著的文学史地位有所强化。新中国成立之后,陆续编写了数十部中国文学史,其中以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1963 年初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1996 年初版)、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1999 年初版)最具代表性,通览这三部文学史中的小说章节,其框架设置和书写方式,仍大体上与《新著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一脉相承,其变化之处主要在于:其一,随着古代小说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文学史中关于小说史、小说作家作品、艺术理论等方面的具体论述,较前更为丰富和准确;当然,因为受到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某些小说的评价和认识,也存在或隐或显的变动调适。其二,明清小说的文学史地位持续提高,以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为例,第 7 编"明代文学"凡 12 章,小说为 5 章,占比 42%;第 8 编"清代文学"凡 8 章,小说为 4.5 章,占比 56%,这一数据充分证明:小说已占据了明清文学史叙述的中心

①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京:北新书局 1932 年初版,第 239 页。

② 据刘大杰自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重版卷首),此书上卷完成于 1939 年,下卷完成于 1943 年。本文取其正式出版时间。

地位。其三,小说名著的文学史地位继续攀升,仍以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为例,共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名著出现在章一级的标题之中,关于上述 12 部小说的论述文字,竟占据了全部明清小说史章节 80% 以上的篇幅,颇足惊人。

至此,若回望早期文学史中小说作为附庸或点缀而存在的事实,诚有沧海桑田之感。在中国文学史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小说无疑是变动最为巨大的一个文体。从排斥到进入,从简陋到丰满,从边缘到中心,小说章节的成长,影响并见证着中国文学史体系的生成和定型。而这一蜕变的发生,实际上主要受制于如下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

其一,文学史观的指引。对中国文学史编写影响最大的文学史观,一个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一代有一代之胜”说,另一个则是从 19 世纪末开始传入的西方的文学进化论,这两大文学史观,都会促使编写者有意识地为每个朝代(或时段)寻找一种代表性的文体,既然诗文词赋至明清已不复往日之盛,那么,新兴的充满生命力的小说戏曲,自然也就被逐步确立为明清文学史的叙述重心。

其二,经典化思维的影响。绝大部分《中国文学史》均作为教材而编写,文学史课程的性质,要求它必须以讲述基础性知识和经典性作品为主,故《中国文学史》编写,事实上就是一个文学经典的筛选、确立和呈现的过程。若将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1999)所涉小说作品,与早期文学史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即尽管两者之间的小说叙述文字差异极大,但古代小说的经典篇目(除三“言”二“拍”外)几乎一致,也就是说,在古代小说的文学史书写开始之初,其经典化格局便已大致完成,之后数十年的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将这些小说经典叙述得更为丰富、更为细致、更为准确、更为合理而已。这与海量的明清诗文词赋尚待经典化处理,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三,学术史的支撑。文学史书写难为无米之炊,可供采择的学术资源越充足,其书写也就越丰满。如前所述,小说章节的成长,几乎是与小说研究同步的,也可以说,正是近百年来古代小说研究的持续推进,文学史中的小说叙述才能够取得惊人的拓展,这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由于作品的湮没,不但早期文学史对此不着一字,就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4)也无奈写道:“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后虽经中日学者的努力搜访,各种庋藏于海内外的三“言”二“拍”版本逐渐为人所知,但其文本则迟迟未得出版,因此,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尽管提及了三“言”二“拍”,却只能根据后世选本《今古奇观》旁敲侧击,略作介绍。至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三“言”二“拍”文本陆续整理出版,相关研究成果也蜂拥而出,于是,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1963)列出专章“明代的拟话本”,以 9 页篇幅详加论述,而至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1999),关于三“言”二“拍”的论述长达 17 页,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并列,各占整个明代小说史的五分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可预见的较长时间内,上述三个制约因素恐怕都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今后新编及修订版《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叙述,或许难有整体性的突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史中的小说章节将停止生长,因为,关于古代小说的“经典性”涵义,不无加以微调扩容和多元细分的空间;小说研究也将继续向纵深推进,某些目前尚不明晰的小说史脉络,会得到有效的梳理,若干作品的文学文化价值,会被更充分地挖掘出来,甚至上升为新的小说经典或次经典。凡此种种,仍将给未来的中国文学史小说书写带来新的可能性。